

“龙象之争”是雾里看花

■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邢予青

中国和印度同属“金砖四国”，这一说法源自本世纪初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古姆·奥尼尔。他曾预言“金砖四国”是引领 21 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。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超过 10 亿的发展中国家，但是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，印度被国际社会标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。因此，“龙象之争”即中印经济发展比较，常常是国内舆论和学者热衷的话题。几年前，印度出现了人类电力史上最大的断电事件，位于印度 22 个邦的 6 亿人，在同一时间突然陷入没有电力供应的状态。这场电力事故，让推崇印度模式、预计印度很快就可以超过中国的学者和评论家，从幻觉回到印度基础设施落后、长期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现实中。

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6.9%；印度增长 7.5%，比中国高 0.6 个百分点。这微不足道的差异，又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兴奋。印度被誉为比中国还要重要的全球经济发动机，甚至有学者预测印度经济规模会在 2050 年超过中国。笔者认为，不看经济规模，仅仅看增长率的对比是不科学和毫无意义的。例如，中国经济从 1980 年以来，每年增长率都超过美国。但是，35 年后不是依然在半山腰上眺望山顶上的美国，还忧心重重地担心越不过“中等收入”陷阱这个槛吗？

2014 年中国 GDP 是 10.4 万亿美元，印度只有 2.0 万亿美元；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五倍。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是 7400 美元，印度是 1570 美元，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是印度的 4.7 倍。因此，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，中国和印度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，印度追上中国有可能，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，笔者认为现在谈论“印度赶超中国”纯属杞人忧天。笃信印度很快赶超中国的学者，喜欢用购买力平价来佐证自己的观点。不可否认，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，印度 GDP 是 7.3 万亿美元，中国是 18 万亿美元，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被大大缩小。印度的许多学者也喜欢引用购买力平价，在国际研讨会上引证印度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。



但是，印度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大幅膨胀的原因，是印度经济开放程度差，国内不可贸易部门比例大导致的结果，这是经济落后的表现。购买力平价理论，是以人不流动为假设前提的，它对于估算低收入人口是否可以获得基本的食物和住房，是有用的，却夸大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实力。我经常对学生讲，

按照购买力平价算人均收入，是富人安慰穷人的安慰剂。按购买力平价算出的 700 美元，是买不了 iPhone 的。购买力平价估算方法，也不考虑不同国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差异。在孟买街上乘坐没有空调、计价器如同水表大并悬挂在窗外的拉达出租车，除了惊险和刺激外，是无法和上海的出租车服务相提并论的。

其他主要经济参数，也同样证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，甚至不是不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，让一些“龙象之争”的讨论成为雾里看花。例如，中国已经发展到开始资本输出和收购海外资产的阶段。2014 年中国海外投资总额达

到 1280 亿美元，印度海外投资额为 75 亿美元，大约为中国的 6%；中国出口总额为 2.5 万亿美元，是印度出口总量的 5 倍之多。中国对印度长期保持贸易顺差。2014 年中国对印度出口的货物达 620 亿美元，是印度对中国出口的 6 倍之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对印度的出口，70%都是普通贸易，不是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加工贸易。这说明中国本土企业自有品牌产品在印度市场竞争力很强。

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参数，也显示印度与中国有很大的差距。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，中国是每千人 11.4，印度则是 49.8，大约是中

国的 5 倍。这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儿童医疗、营养和生活环境质量的差异。尽管印度近几年来电力装机量有了进步，但是印度的电网覆盖率只有 78%；将近 3 亿印度人，依然没有被电网覆盖无法获得电力。中国电网覆盖率在 1990 年就已经达到 94%。根据世行统计，2013 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耗水平是 3760 千瓦，人均消耗电力是生活质量和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印度的人均电力消耗仅仅 724 千瓦，相当于中国的 20%。可笑的是在一个中印比较的国际研讨会上，一位学者以印度人均耗电低为依据，振振有词地说印度发展模式比中国可持续。这位学者根本不知道在印度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都可以有电，是一种渴望而无法实现的奢侈。印度人均用电量是低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可用，而不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“自愿”停电的义举。

不可否认，印度经济也有其强项。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非专利药出口国。在全球制药价值链上，中国药企属于给印度提供原料药的打工仔。印度药是名副其实的物美价廉，笔者有亲身体会。上次在名剧孟买机场候机回东京时，突然出现腹泻。就在机场的药店买了 10 片止泻药，吃下去后，立竿见影，在飞机上再也没有出状况。止泻药非常便宜，折合人民币 0.15 元一片。此外，印度的软件外包服务出口，全球第一，占全球软件外包服务出口 55%。

龙和象各有各的优势，经济互补是主流。中国和印度在有的经济合作，是共赢的策略。中国制造业和基础建设业，可以利用印度的市场，消化过剩产能，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；印度的软件和制药业，也可以从中国的巨大市场获益。

中国经济依赖投资起家，为什么这一模式今天难以为继？中国下一步如何走？当下的中国相当于日本哪一年？

消失的民间投资，中国经济下一步？

■ 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 徐瑾

中国经济数字始终耐人寻味，二季度 GDP 增速是 6.7%。这一成绩高于市场预期，增速数据变暖，是预示经济触底回升还是一次回光返照？

对比数据的变暖，民间更多是寒气十足，体现为民间投资不振与资产荒——6 月制造业 PMI 为 50.0%，小型企业 PMI 为 47.4%。与此同时，融资仍在发力，根据中国央行数据，2016 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9.75 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多 9618 亿元，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达到 11%，几乎接近 GDP 实际增速的两倍。

这也意味着经济回暖很大程度来自投资。低迷之中，谁在投资呢？首先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。今年 1 至 6 月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2.8%，比去年同期回落 7.3%；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61.5%，比去年同期降低 3.6%。对比之下，国有企业投资则逆势前进，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达 23.5%。

民间投资萎靡，国有投资跃进，其实揭示中国经济更大的图景。关于中国经济争论很多，尤其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。比如一方面投资低迷，一方面投机横行；一方面货币却升值，一方面企业抱怨融资贵；同时地王却肆无忌惮等等。为什么会如此？看似矛盾的现象，其实呈现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割裂。简单而言，即国有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对峙。国有经济与民间经济之间，即使表面上看价格以及准入已经取消双轨制，但是从信贷投放、资源分配等核心要素来看，国有与民间的双轨制仍旧存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一二线民企背后往往有各类势力照应不同，中小企业可谓绝对弱势。最典型如房地产市场，2016 年可谓央企推动的地王之年，前五个月超 15 亿地块高达 105 宗地块，其中难觅中小型房企身影。

理解中国经济的长期逻辑，必须抛开一时一地的数据，往更长的时间段去思考，或许我们可以借助邻近日本的经验。作为赶超型经济体的模范，日本的经济增长也经历了高速发展，投资拉动经济以及出口导向战略也曾经是日本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，到上世纪 80 年代“日本第一”的口号流行一时。那么日本经验能够给中国什么启示？具体来说，当前的中国经济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？如果相当于日本的 60 年代，那么发展潜力仍是巨大。如果相当于日本的 80 年代，那么发展潜力仍旧堪忧。

日本高速发展期主要是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，在 60 年代的经济增速高达 10% 左右；70 年代之后到 90 年代初期则是低速发展期，平均发展速度低于 5%；进入 90 年代之后是失去的二十年，整体发展速度低于 2%。日本的增速为何停滞？

这是何停滞上的大问题，其中原因很多，不少人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 80 年代广岛协议作为契机来分析，但是政府政策在经济中的角色更值得玩味。日本发展模式中的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，在日本经济成败中的同样值得关注，其象征是 70 年代的“列岛改造计划”。

“列岛改造计划”是 1972 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的竞争纲领，其目的是对日本进行综



合整体开发，而不是仅仅是局限于东京等大都市。这一方案的出炉有着地方政治的影响，也帮助田中赢得竞选，其内容包括重新布局工程、建设 25 万人口城市等。然而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到来，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可谓中途返航，但是列岛改造计划仍旧埋下了日后危机的隐患。

如日本学者如八田达夫等人指出，日本经济下降并非因为石油危机。石油危机只是导火索，导致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宏观政策的失败，其中列岛改造计划可谓典型代表。八田达夫指出，日本经济的发展动力源自城市化，正是高生产率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，让不断迁移的劳动力得到发挥，从而整体生产率得以提升；但是列岛改造计划则反其道而行之，其核心思想是建造大量基础设施为地方创造岗位。

这种国土均衡的发展策略显然有政治考虑，但是经济上则毫无效率，在大量人为刺激投资的带动之下，日本迅速成为全球人均资本存量最高的国家，由此埋下随后数十年投资不景气的根源，并最终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放缓。

日本作为中国的镜子，那么日本的发展的路径能够给予中国什么启示？今天的中国经济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？

从乐观派而言，断言中国只是相当于日本的 60 年代，未来可能还有 20 年的高速发展期，不仅可以迈入高速增长国家，甚至有可能超过美国。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之一是中国人均 GDP 目前比起美国仍旧较低，比如按照 2005 年购买力平价对比，中国人均收入对比美国只是五分之一左右，也与减速期的德国、日本、韩国差距很多，因此中国经济还有增长潜力。

从悲观派而言，上面说法忽视了很多低收入国家虽然同样只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 1/5，随后的发展速度却并无亮点；具体到中国，当前中国非政府债务占 GDP 之比已经超过 200%，投资带动投资的模式已经尽头，投机盛行以及地产泡沫，分明已经是日本 80 年代末期崩溃的前期。

哪一种观点比较正确？在历史之前，不得不谦卑。日本高速增长期到了 70 年代初期，如果站在 1972 年，如何判断日本下一步，那个阶

段和当下中国有什么不同？习李政府执政之后，在提出经济“新常态”的同时，其实对于经济所处位置曾有一个“三期叠加”的判断，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、结构调整阵痛期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最后一个判断，即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，正是针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系列刺激政策而言。

当年 4 万亿刺激政策出台，其实拉动了民间与地方政府无数个四万亿，从 2009 年到 2012 年四年投资完成额高达 116 万亿元，由此导致随后数年过剩产能问题日益严重。然而此后，中国投资并没有下降，在 2014 年到 2015 年的 2 年之内，中国投资完成额 107 万亿元，几乎相当于“前期刺激期”4 年的投资量。

通过上文的比较，笔者认为日本的 1972 年很可能类似中国的 2008 年，尤其是政策应对方面。为应对金融危机，中国以四万亿刺激政策引导经济短期迅速回升，但是其结果却是后来几年的漫长消化，而日本在石油危机之后大幅拉动投资的做法何其神似。

中国经济依赖投资起家，作为后发经济体无可厚非，尤其过去在一张白纸上大搞城市化，非如此走走不通，今天难以继？关键就在于，随着民间投资增速下降，经济压力增大，这时候国有投资甚至政府投资继续加大力度，而这些投资并不以追求合理经济回报为第一目的，这样情况下，经济结构继续恶化。

如此来看，中国下一步如何走？早在 2013 年，中国国内已出现迷茫，关于要不要走日本老路、避免失去二十年的呼声已起，我当时就指出，中国和日本情况不同，对比日本的富而衰老以及富而通缩，中国很可能面临未富先老、未富之前遭遇通缩危机。

困境之下，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两种危机调整：一种是冲击式调整，如果中国不主动调整，在外币贬值以及汇率波动下，类似韩国 98 年情况重演，在一次剧烈的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痛苦的出清；一种是日式情况，如果条件允许，这种可能性更大，即通过二三十年的缓慢增长，增加政府杠杆以降低企业杠杆。这种情况下，国民感受或许比较温和，但是恢复增长的疗效会比较缓慢。

长痛还是短痛？无论哪一种道路，低垂之果已经被采摘殆尽，容易的道路也几乎走完



经济学家们不应退出公共生活

■ 哈福德

你可能听过有关经济学家含糊其辞和争吵不休的笑话。其中最妙的一个笑话来自罗纳德·里根，他说：给经济学家玩的“棋盘问答”游戏，“有 100 个问题，3000 个答案”。

但在英国退欧问题上，主流经济学家的意见没有分歧。在英国举行公投（投票结果以微弱但确凿的优势决定脱欧）两个星期前，研究集团宏观经济学中心对一组经济学专家进行了调查，询问他们认为英国投票退欧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何种后果。回答是一致的，唯一的分歧在于，有些人认为会造成比较糟糕的后果，还有些人则认为会造成极其糟糕的后果。

退欧派选民似乎没有把这个前所未有的警告放在心上；在近 200 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

在英国脱欧问题上，经济学家意见空前一致，却无力回天。但公共生活太过宝贵，不能完全交给政客。

表现中心(CEP)主任约翰·范里宁认为，经济学家不应过于自责。他说：“我们听做的事情感到自豪，(如果经济学家更多地参与进去，)坦白来说，我认为结果不会有一丝毫不同。”

范里宁的想法没有道理；只靠陈述事实，专家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。

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·卡亨研究我们辩论争议性政治话题（比如气候变化和控枪）的方式。他指出，激烈的感情和笃信的价值观往往会制约我们对这类话题的思维方式。反对此类监督的人往往本能地怀疑气候变化，担心国家想利用这个问题增强控制；那些不信任大企业的人会本能地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，然而却倾向于不相信声称转基因食物是安全的科学家。

向人们展示会威胁他们笃信的信念的证据，往往会适得其反，因为我们会从自身的情感出发，选择性地接受符合这些情感的事实。

卡亨认为，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，招募能够混淆人们的刻板印象的专家（或许像这样：一个西装笔挺的伦敦金融城(City)经济学家向人们解释欧盟的法律保护劳工权利）。另一个可能做法是，在陈述事实之前，先认可人们的价值观——比如，在移民面前保全社会特色的意愿。卡亨和他的同事也发现，当证据由一群彼此差异较大的专家提出的时候，人们会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。问题可能在于，经济学家看起来彼此差异不那么大。

最终，没有什么能替代对公众生活的持续参与——科学家们艰难地得到了这个教训。多年的反科学舆论让科学家大为受挫，之后他们意识到，公众之所以在转基因作物或者疫苗这样的问题上无视他们的意见，是因为他们回避在媒体上露面。冒牌货和活动人士乘虚而入。

因此，在 2002 年，科学媒体中心成立，其使命是确保当科学或者伪科学登上报纸头条时，能够在有在业界有一定声望的科学家对记者发声。“任重道远”，剑桥大学的统计学家和风险沟通专家戴维·施皮格霍尔尔特说。但他表示，科学媒体中心的确保科学报道的质量提高了。

经济学家是否也应该效仿这个做法？可能。但造势运动的行事方式不会让这个做法容易实施。当初那些站出来解释问题的经济学家，被人用最粗俗的语言斥为腐败或者无能。如果有人想要躲开这样的恶意中伤，我们不应责怪。但如果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展现出什么，那就是公共生活太过宝贵，不能完全交给政客。

(作者著有《卧底经济学家反击战》)